

导 论

自从由一定的领土疆域和居民人口所构成的国家产生后，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便有了各自不同的国情。国情，是探寻治国安邦之道的基础和依据。对于一国的领导者来说，能否了解、掌握本国的国情，并根据本国国情，顺应历史趋势，制定和贯彻正确的发展战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各级政府的公务员，更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研究、学习我国的国情和发展战略，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第一节 国情与发展战略的涵义和特点

一、国情的涵义和特点

国情，顾名思义就是国家各方面的情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国情的内容很丰富，实际上它包含了有关我们中国的一切情况，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的……等等，一草一木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国情。”^① 内容广泛的国情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范围：自然概况（主要包括地理、气候、资源、环境等）和人文

参见《中国国情国力》1992年第1期。

概况(主要包括人口、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

国情是客观的、实际的。无论是国情的自然属性，还是它的人文属性，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按照自身的规律在发展。不管人们认识与否，它都客观地影响着该国的经济社会活动，都在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只有按照客观的国情办事，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脱离国情，主观行事，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受到客观的国情及其规律的惩罚。

国情的诸因素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构成国情的诸多因素，表面上似乎杂乱无章，其实是排列有序的。它们之间互为条件，互相制约。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各有自己的特性和规律，但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的社会活动总是离不开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自然生存环境的条件不同，人们的社会活动方式也不同。人们在依赖自然生存环境的同时，必然又要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形成社会的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

国情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一国的国情，一方面有其相对稳定、变化较少的因素，如地理条件的变化是十分缓慢的，国家的领土范围也是比较稳定的；另一方面又有容易变动和比较活跃的因素，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口增减、资源发现、环境变化等，一年不同于一年。如果我们只是静态地观察国情，便会忽视对新情况的了解、对新问题的解决；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国情的动态方面，忽视相对的静态方面，也不能确定和掌握较长期的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

国情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国情有其历史的方面，也有其现实的方面。研究现实的国情，不应割断与历史国情的联系。今天的中国，是从昨天的中国走过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发展而来的。如果割断历史，我们就无法理

解为什么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国家是由局部组成的整体，国情包含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国情是由省情、市情、区情、县情、乡情以及其他局部情况构成的庞大系统。离开省情、市情、区情、县情、乡情以及其他局部情况，便无法了解国情。我们要掌握全国的国情，就必须了解各个局部的状况。50年代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写出《论十大关系》透彻地分析中国的国情，制定相关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因为他从各地的调查研究入手，认真听取许多国家部委的汇报，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和各条战线的经验。局部是整体的基础，没有局部便没有整体。当然，局部也不能离开整体，局部的情况受到整个国情的制约。

二、发展战略的涵义和特点

发展，作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变化的一种历史过程，是始终不断地延续着的，它构成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双重系统的行为变动轨迹，并将导致这一复杂系统朝着更加均衡、和谐、互补的方向进化。如果着重从社会主体的角度考察，发展则表现为由人类参与的包括生产能力、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诸方面变化在内的经济社会活动的进步过程。战略，最初出现在军事领域。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指出，“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它包括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计划和达到这一目标的行动措施、战局方案及战斗部署，即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① 随着时代的

参见于光远：《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4页。

推移，战略所具有的全局性谋略的涵义，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政治、外交、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把战略与发展联系起来，构成“发展战略”词组 起始于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赫希曼。他在《经济发展战略》专著中，首次提出发展战略的概念。这一提法把经济发展上升到战略地位的高度，并把经济发展与作为其必要条件的社会发展诸因素结合起来。当时，发展战略主要是用来研讨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潜力、自然资源和其他的社会环境，来制定谋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划。但在后来的运用中，它不再限于发展中国家，而被泛指一切国家和地区制定的谋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划。

由上述内容可见 战略的概念 源于军事学 后来引申到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所谓发展战略，即是由国家权威组织根据具体国情制定的指导社会领域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发展的重大的、宏观的，亦即涉及全局的决策。发展战略当然也可以由民间机构、社会贤达、精英分子提出，如美国的思想智囊库兰德公司、英国的伦敦战略研究所、日本的野村研究所等机构，经常进行宏观战略研究。但是，它不同于我们这里说的国家决策。作为国家决定的发展战略，具备有目标、有任务、有原则规定、有政策措施、有组织力量配置实施等一系列的特点。在我国，作为公务员学习的发展战略，是指由权威组织制定的，纳入党和国家主要政策体系的，关于社会领域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发展的重大的、全局性的谋划。

发展战略具有统一性的特点。任何一个发展战略，都反映了国家整体的指导原则与运筹方案，也是由国家的权威组织统一制定、实施的。从空间范围来说，它在制定该战略的某一国家或地区处于支配全局的法定地位，而不只是影响其某些局部范围。因此，

任何局部都不应游移或逃逸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战略之外，不能拒不执行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战略。虽然各个局部的情况不尽相同，在发展战略中所居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以及发展速度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被无一例外地纳入发展战略体系之中，在发展战略中得到协调一致的发展。

发展战略具有长远性的特点。任何一个发展战略，都是为了解决某些突出的、宏观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不是短期所能完成的，必须分期或分阶段地进行。从时间方面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略制定者对战略运行过程中时序规律的把握。这种时间上由各阶段构成的长远性，要求在发展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措施以及战略实施步骤上，按照一定的时序步骤进行战略管理，使战略呈现时序上的功能效应，在远期产生预想的战略成果。如果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非要超越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盲目追求发展的高速度，必然违背战略的时序规律，导致战略的重大失误。当然，时间的长远性并不是完全远离现实问题或眼前利益的，它和分期实现阶段性的目标并不矛盾。

发展战略具有能动性的特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决定了发展战略的相对性。因此，发展战略的制定、组织和实施的整个运作过程，都需要发挥战略管理主体的能动性。一方面，时间的持续发展要求人们吃透国情，审时度势，及时制定战略；而战略一旦形成，决策主体又必须根据时间的推移和信息的反馈，按照变化了的国情，对战略进行适时的修正。另一方面，空间的不断延伸扩展了发展的领域，这就需要不断认知新的领域，并根据变化了的空間重新制定或修改发展战略。总之，战略管理主体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制定和完善发展战略。

第二节 学习国情与发展战略 的意义、原则和方法

一、学习国情与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正是在深入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基本路线和战略决策。

只有认清中国的国情，才能制定正确的战略，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前提，也是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邓小平说：“过去搞民主革命 要适合中国情况 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②由于国情与战略问题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入开展新时期以来中国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学习，就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个理论，包含着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深刻分析和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科学规定。通过深入学习中国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可以使我们对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3 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3 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并为丰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出应有的努力和积极的贡献。

理论来自实践，又推动实践的发展。深入学习中国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为我们在实践中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贯彻党和国家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开辟各条战线的崭新局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的各级政府公务员对中国基本国情‘毫无所知’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茫然不解’就会导致“盲动”偏离正确的方向出现严重的失误。

二、学习国情与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

原则，是人们说话、办事所依据的规矩或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原则是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研究的结果，“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①。表现为精练化、条理性的概括，具有普遍的指导性。人们在社会中从事一定的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我们学习国情与发展战略也是如此，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前所述，国情的显著特点是客观实际性，发展战略的显著特点是系统规律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恰恰是实事求是的关系，即客观被主观正确、科学地反映，被主观认识与掌握。因此，在国情与发展战略学习中，特别要强调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只有真诚地面对实际，了解全国的实际情况，才能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全面、系统、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调查研究的原则。现在，国家统计局及有关部门每年都向全国公布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为我们了解国情和发展战略提供了方便。但是，了解国情和发展战略仅仅依靠文字材料还是不够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74 页。

人们的社会生活丰富多采，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实践经验异彩纷呈，思想状况千差万别，这些生动的实际情况，都是无法为现成的书面东西所全部反映的。这就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学好国情和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江泽民同志在 1993 年全国各省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会议上说：“坚持做好调查研究这篇文章 是我们的谋事之基 成事之道。”^① 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每年都要有一定的时间，深入基层做实际调查。

全面而有重点的原则。邓小平说：“观察中国的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② 这说明，观察问题要有全面的观点，从多层次、多角度去认识。既要了解自己的优势，也要了解自己的劣势；既要看到有利的因素，也要看到不利的因素；既要看到主流的一面，又要看到支流的一面；不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我们无疑要全面地掌握国情和发展战略，获得全面性的认识。但是，由于时间和精力限制，我们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不可能事无巨细地了解一切、深入研究所有的一切。这就需要有选择、有重点地予以区别对待，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998 年 7 月 17 日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国情；中国社会主义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初级阶段，这也是国情。必须把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这八个字统一起来认识和把握。”^③ 这就是说，只有充分认识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

① 闰韵等主编：《江泽民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86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00 页。

③ 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5 页。

大影响的决定因素，才能把握革命和建设的内在规律，理解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为国家服务的原则。学习国情和发展战略有着明确、直接的目的，这就是为国家服务，也就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当代，许多发达国家研究国情和发展战略的机构，无不为企业或政府的利益工作。著名的美国兰德公司、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等，都在向政府或企业提供决策依据和战略蓝本，起着重要的智囊团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的公务员更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钻研国情和发展战略。

三、学习国情与发展战略的主要方法

国情与发展战略，是一个极其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学习国情与发展战略，必须运用多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辩证分析的方法。辩证分析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分析方法，就是矛盾分析的方法，就是运用发展的观点、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来观察、分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问题。它与形而上学的方法相对立。在国情和发展战略研究领域，如果缺少辩证分析的方法，就容易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片面地看问题。例如，过去我们总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凌驾、征服、攫取的关系。这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国家的自然资源状态，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用辩证方法分析国情与发展战略，就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国情与发展战略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和反映。由于人与自然的矛盾，由于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导致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影响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

关系，推动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发展变化。只有抓住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对其进行辩证的分析，才能科学地掌握国情与发展战略的真谛。

系统分析的方法。国情与发展战略，是一个具有多层次、有序结构的统一整体，因而必须采取系统的观点，进行分析与综合研究。国情与发展战略的各个系统及其要素间有着广泛的、内在的相互联系，它们都不能游离于整个系统之外，每个系统及其要素都不过是国情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网点。在国情与发展战略的各个系统及其要素中，若某个重大系统及其要素发生重大变化，那么整个国情与发展战略就会改变自己的结构和功能。比如，某个社会的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会导致相关国情与发展战略的重大变化。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就是要研究国情与发展战略的各个系统及其要素的层次、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

历史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把国情与发展战略放到一定的历史范畴之内，把它看成是一定时空和环境条件下存在的，把它和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联系起来，和这些相关的因素结合起来，作为分析国情与社会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其二，把国情与发展战略的形成看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们都有其历史渊源，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都有必然的历史发展逻辑。

比较分析的方法。主要有：横向比较法，即把我国的国情与发展战略同其他国家的国情与发展战略进行比较分析，这样可以起到启发借鉴、取长补短的作用；纵向比较法，即把我国的国情与发展战略同历史上的国情与发展战略进行比较分析，以便融会贯通、继往开来；正反比较法，即通过对国情的认识和发展战略制定的成功与失败的实例进行比较分析，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第一章

人口状况与人口发展战略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多，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口不仅规模大，而且结构不尽合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我国政府对人口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片面强调人口的正面作用，忽视了它的负面影响。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真正开始重视人口问题，逐渐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生育管理之路。人口管理不仅仅指生育管理，也涉及到对人口流动的管理。人口的迁移流动关系到人口素质的提高，是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在人口流动管理方面同样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人口问题带有很强的惯性，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由于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传统的管理方式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人口问题将是一项需要长期着力解决的问题。

第一节 我国人口概况

一、人口现状

人口多是我国国情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素。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死亡率不断下降，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在解放后一段时期内育龄妇女的生

育率一直较高，除困难时期的 1961、1962 年人口有所减少外，中国人口数迅猛增加，1954 年人口数量超过 6 亿，10 年后人口又增加 1 亿，1964 年超过 7 亿。在接下来的短短 5 年时期内，人口数量又增加了 1 亿，1969 年达到 8 亿，1974 年中国人口数量超过 9 亿。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育龄妇女的生育率迅速下降。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育龄妇女的绝对数量大，尽管人口增长速度有所减慢，人口规模却在不断扩大，1981 年人口数量超过 10 亿，1988 年人口超过 11 亿。近几年来，我国每年净增人口仍在 1300 万以上，1995 年人口达到 12 亿。新中国 46 年间人口数量就翻了一番。1997 年底，包括台、港、澳地区在内，我国总人口已经超过 12.6 亿。

1997 年与 1970 年相比，人口出生率由 33.43‰ 降到 16.59‰。人口自然增长率由 25.83‰ 降到 10.06‰，妇女总和生育率^①由 5.18 下降到 2.0 左右，低于更替水平。不足 20 周岁结婚的妇女占全部初婚妇女的比例已经从 43.05% 下降到 0.8%。1996 年与 1991 年相比，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从 22.2 岁提高到 23.0 岁，平均初育年龄从 23.4 岁提高到 24.0 岁，生育第一个孩子与生育第二个孩子的间隔从 3.0 年延长到 5.0 年。按国际通用标准，我国已经属于低生育率国家。

我国广大城市已经基本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农村正处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广大群众婚育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不断提高，人

^①总和生育率是指：如果一群妇女按照一组特定的分年龄组生育率度过整个育龄期并且无一在育龄期内死亡，那么平均每名妇女将会生育的子女数。它表明一个年龄标准化的生育率度量指标。

民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妇女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若按 1973 年的生育水平推算，20 多年来，我国累计少增加 3 亿多人口。特别是“八五”期间，正值生育旺盛期妇女 20—29 岁人数处于高峰期，我国不仅有效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平稳度过了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而且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全民族素质起了重要作用，也对稳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人口结构及其再生产的特点

我国人口目前占世界人口的 22%，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人口规模大是我国人口最大的特点。除了人口数量之外，我国人口在结构以及再生产方面还具有自己的特点。

1. 人口结构不合理

(1) 人口老龄化。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一个国家如果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 10% 或者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 7%，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就是老龄型的，这样的社会就是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中国也不例外。随着生育率的急剧下降以及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步伐逐渐加快。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年龄在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990 年为 5.80%，1994 年为 6.05%，1995 年为 6.18%，1996 年为 6.30%，1997 年为 6.43%。到 1999 年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主要原因是 20 多年来我国计划生育工

作的开展以及近 20 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持续进步对人们生育观念的影响，导致了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使得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同时，也由于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长寿老人增多，使得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提高。

从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看，人口老龄化本身是经济发展到了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但中国却是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迎来白发浪潮冲击的。老年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导致在一个较短时间内，中国一定比重的劳动力数量所支撑的老年人口数将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的确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随着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需要解决一系列与人口老龄化有关的人口问题，包括老年社会保障、老年健康、老年就业等一系列问题，这不能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劳动力队伍的老龄化也应引起足够重视。1990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是 34.09 岁，到 2000 年达到 36.10 岁。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还将继续升高，劳动力队伍将进一步老龄化。

(2) 人口素质较低。人口素质主要是指人口健康水平、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一定时期的人口素质反映了一定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目前人口素质并不低，但对迅速起飞的我国经济而言，目前的人口素质，特别是人口文化素质难以适应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我国文盲、半文盲人口多，人口平均文化程度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与总人口比例小，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1995 年我国文盲率为 15.5%。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6 年，仅相当于小学毕业水平。受过大专学历以上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足 2%。15—45 岁的青壮年中，文盲仍占到 7% 左右，全国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 1996

年达到 7 年，只相当于初中二年级水平。在广大农村，文盲半文盲所占比重更大，而且还在产生新的文盲。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比发展中国家印度还要低。对许多成年人来说，要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难度很大，但这些人却在承担着建设的重任。他们现有的文化素质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健康水平是人口素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国人口健康素质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婴儿死亡率由建国前的 200‰ 下降到 1995 年的 31.4‰，先天畸形和智残发生率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据研究推算，我国每年仍有 20 万—30 万肉眼可见的先天性畸形儿出生。我国共有 1800 多个县为碘缺乏病地区，在这些地区，儿童智商低于正常值 10—15 个百分点。在山区、贫困地区，近亲或近血缘婚配现象依然存在，遗传病发病率仍然较高。

(3) 人口出生性别失衡。出生性别比，是指人口在一定时期内活产婴儿中男女性别的比率，以 100 名女性为单位计算出相对的男性人数，就是出生性别比的数值。在一定规模的出生人口中，活产的男婴总是多于女婴，男女婴儿的比值为 106 左右，即每出生 100 个女婴的同时就有 106 个男婴出生。106 左右是国际公认的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就已失衡，1981 年为 108.48；1987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所得到的 1986 年和 1987 年上半年的出生性别比为 109.46；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得到的 1989 年和 1990 年上半年的出生性别比为 112.14；1993 年全国 0—4 岁幼儿平均的性别比为 113.28；1994 年这一数字又跃升到 116.30。这就意味着，我国人口尤其是未来成年人口性别比结构失衡的态势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

2. 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特点

人口再生产类型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的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以及自然增长率三者不同的组合形式。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变化取决于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以及由这两者的变化所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发展变化是受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的，因而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以及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等三种不同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表现为高出生率、极高死亡率与极低增长率，人口平均寿命短，世代更替迅速；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特点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与较低的增长率，人口平均寿命逐渐稍有延长；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特征是低出生率与低死亡率相结合而形成的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平均寿命延长，世代更替缓慢。由于社会历史的进步，人口再生产类型不断由低级向高级转变。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经历了重大转变，正在向现代型转变。这种转变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条件下发生的，主要是计划生育工作带来的成果，并非完全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带来的自然转变。当然，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促进人们提高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认识和改变传统生育观念，也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自 1979 年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这一转变的实现更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总的说来，由于社会经济与政策背景的不同，我国的人口转变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

(1) 人口转变的速度快、周期短。北欧、西欧各国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最早，从而人口转变也最早完成。但是，它们的转变是缓慢的、渐进的，都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这些国家的人口

死亡率从 30‰—35‰ 的高水平降到 10‰ 左右的较低水平，大约用了近百年的时间。出生率从 30‰ 左右下降到 20‰，长的如法国用了 70 多年，短的如英国也用了近 30 年。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经济建设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从 1949 年的 20‰ 下降到 1957 年的 10.8‰，只用了 8 年时间，这一速度大大快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如瑞典的死亡率从 17‰ 下降到 10‰ 经历了 65 年时间，英国用了 53 年。再从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看，新中国成立前的平均预期寿命仅有 34 岁，1957 年根据对 3000 多万人口的调查，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 57 岁。1975 年据对 26 个省、市近 1 亿人的调查计算，又上升到了 68.18 岁。不到 30 年的时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 30 多岁。而根据一些发达国家及地区（丹麦、英国、法国、荷兰、挪威、瑞典和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的数据计算，其平均预期寿命由 40 岁左右提高到 65 岁左右至少用了 100 年时间。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更为缓慢。如印度 1951—1960 年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在 40 岁左右，到 1970—1975 年间，平均预期寿命仍在 50 岁以下。可以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低水平向较高水平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这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总的看来，我国人口死亡率水平由高到低的转变时间之短、速度之快，为世界其他各国所罕见。

同样，新中国的出生率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从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 30‰ 以上降至目前的 20‰ 以下，仅用了 20 年的时间。70 年代前，我国妇女的生育水平一直较高，1949—1969 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 5.8。进入 70 年代后，生育水平开始迅速下降，从 1971 年的 5.44 下降到 1980 年的 2.24，再到 90 年代的平均值 2 左右，说明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也是很快的。与此相比，国外如日本的总和